

# 新知

上海辞书出版社

No.1

### 《辞海新知》编辑部

主编：李伟国  
编　　辑：吴雅仙 赵荔红  
　　　　乔 尹 冯 涛

### 《辞海新知》第一辑

责任编辑：赵荔红  
版面设计：姜 明  
封面设计：姜 明

主 办：上海辞书出版社  
编 辑：《辞海新知》编辑部  
出 版：上海辞书出版社  
地 址：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200040  
电 话：021 - 62472088  
传 真：021 - 62894365  
电子信箱：cishu@online.sh.cn  
印 刷：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发 行：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  
书 号：ISBN 7-5326-0555-8/Z·24  
定 价：6.80 元

《辞海》是中国唯一一部大型综合性辞典的书名，他兼容整个人类知识体系的一百多个学科，十年修订一次，增补新知，修正旧说。

“辞海”又意味着词汇的海洋、知识的海洋、思想的海洋。知识与思想是以词汇作为物质形态的，而词汇是活泼泼、充满生机的，是灵动的、变化的，知识与思想也是需要不断补充、更新的。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文化、学术、科技进步一日千里，知识创新速度大大加快。

庄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确实，就一己而言，在知与思的海洋中是渺小不足道的，但就人类群体而言，其认知总体是伟大的。

《辞海新知》就是在知与思的海洋中注入新的点滴积累。作为一种连续出版物，及时为读者提供最新的知识和思想动态。其内容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几方面，有新思潮、新观点、新事物、新发现、新成果、新词语等等。

《辞海新知》以直接和正面阐

述“新知”为主，也欢迎讨论和争辩。在《辞海》中，表述总是权威的、公认的，在《辞海新知》中则可以是探索性的、未定型的。《辞海新知》不是词典，而是以清新可读、短小精悍的文章，奉献给渴求新知的读者一份解渴的新饮品，同时又记录着新知新词发生的轨迹，为《辞海》修订积累资源。

《辞海新知》约请知识界人士撰文，也欢迎广大读者参与其中，不吝赐稿。

《辞海新知》希望能成为您的好朋友。

# 缘起

李伟国

季

羨

林

# 寄语

本世纪以来，中国一直有两个文化中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30年代我读大学时，全国刊物最多的是上海，北京居第二，其中，《东方杂志》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现在，上海应该有一份内容充实、有影响力的刊物，我祝愿《辞海新知》成为这样一份刊物。当年，蔡元培主张学术观点要兼容并包，也主张学科之间要相互交融。学问的道路是越走越宽的，而不是越走越窄。我希望你们持守这样的信念。



季羨林

季羨林先生与本书编辑合影 摄于 1998 年 11 月 5 日



# 第一輯 錄

目  
錄  
解  
說

## “五四”八十年

王元化	思考“五四”	2
张静如	“五四”与中国现代化	6
朱维铮	“五四”：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	10
谢遐龄	反思“五四”与目的论之解构	19
张汝伦	与历史事实直面相对	30

概念：解构（20） 形式主义（23） 理性主义（24） 目的论（27）

资料：《新青年》（32） 《东方杂志》（34） 《解放与改造》（15） 刘师培（15）

张东荪（35） 张君劢（35） 《凡尔赛条约》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18）

陈思和	从“共名”到“无名”——90年代文学反思录（一）	38
-----	--------------------------	----

周尚文	回到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纪略	43
-----	-------------------------------	----

张奇方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一封未收入中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版的信	48
-----	----------------------------------	----

洪 涛	生存论与空间论——“自由”义释	52
-----	-----------------	----

李瑞雷	俄罗斯危机——“低信赖社会”脆弱性的暴露（编译）	60
-----	--------------------------	----

王冷一	欧元“列车”启动	64
-----	----------	----

尤联元 黄河断流——问题与对策 ······	68
范成新 王苏民 太湖水污染和富营养化问题 ······	73
徐 星 中华龙鸟 ······	80
甄溯南 恐龙不“恐” ······	84
 ■旧学新说	
曾 亦 天人感应说 ······	89
 ■文谭	
余 斌 给《海上花》“算命” ······	91
舟 晚 梦无边 ······	98
梅 津 美与自然 ······	102
 ■时尚	
林苏闽 黑客：盲目的先知 ······	105
李 果 高科技 重新教我们看电影 ······	111
林 文 电子商务，能火起来 ······	116
 ■新词语	
贺国伟 泰慕塞尔（79） “反弹”别义（120）	
林 静 “金领”阶层（115）	
 ■看图说话	
郑辛遥画 裹陵文 ······	122
 ■补白	
王有朋 域外珍籍有新编（121） 本社新书（29、42）	

**编者按**

今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八十年前这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运动，对现代中国的社会和思想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我们早已视其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为此，深入研究“五四”运动和“五四”时期这段历史，反思“五四”时期提出的口号和问题，对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有关“五四”的论述很多，在这世纪之交，我们特发表一组文章，从不同的侧面研讨“五四”，意在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



# “WuSi” “五四” 八十年

# “Wu Si”思考 “五四”

王元化



王元化先生近影

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我对自己的学术思想作了反思。这场反思迄今仍在持续，但尚未将这两年的反思撰写成文。自一九九六年起，我曾以这方面的内容，先后在南京大学、上海师大、杭州大学、华东师大、上海戏剧学院、复旦大学、郑州三联越秀的学术讲座、中国美术学院，作了每次近三小时

的演讲，题目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再估价》。

现将要旨简述如下：

一、不应因袭过去陈说，将“五四”时期的文化简单看作是“文白之争”或“新旧之争”，因为这两个概念不能完整地规范“五四”时期文化的整体，它具有更深远更广阔的内容。我认为，近年来受到学术界重视的“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是“五四”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从这方面去衡量“五四”时期的学人，过去惯用的文白界限和新旧界限就很不适用了。因为倡导白话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并不是个个都能体现上述这一特点的，有的甚至很不符合这一要求。而那些用文言写作的，也有人吸收了外来的自由思想，坚持学术的独立地位。

一、长期以来，人们用德赛二先生来概括“五四”文化思潮。但真正可以作为“五四”文化思潮主流的，是不是民主与科学还值得探讨。当时这两个概念是提出来了，并得到了相当普遍的认同，但对它并没有较深入的认识，理解得十分肤浅，仅仅停留在口号上（以至至今还需补课）。就以民主来说，关于民主学说的源流，它在近代西方所形成的不同流派，我国开始接受外来民主学说的历程及其存在的问题等等，我们都缺乏切实的研究。一般教科书介绍民主观念大抵偏重于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民主革命经验，特别关怀卢梭的契约论和公意说，而对于英国经验主义的民主学说，如洛克等人的学说，则茫然无知。（我本人长期以来就陷入这种偏向之中。）

一、“五四”时期的思想成就主要在个性解放方面，这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长期以来，我国儒家传统轻视个性，这是一些遵从儒学传统的人（如杜亚泉、梁漱溟等）也承认的。自我意识

近年来受到学术界重视的“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是“五四”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

真正可以作为“五四”文化思潮主流的，是不是民主与科学还值得探讨。

“五四”时期的思想成就主要在个性解放方面。

“五四”时期所流行的四种观念是值得注意的：庸俗进化观点；激进主义；功利主义；意图伦理。

“五四”是反传统的、但不是全盘反传统。

从长期酣睡中醒来，开始萌发于清代中叶，以龚自珍的诗文、曹雪芹的小说、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惠棟的《易微言》等为代表。但这些个性解放思潮的萌芽只是“五四”时期波澜壮阔的个性解放运动的微弱先声。“五四”时期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是值得我们近代思想史大书特书的。

一、“五四”时期所流行的四种观念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庸俗进化观点（这不是直接来自达尔文的进化论，而是源于严复将赫胥黎与斯宾塞两种学说杂交起来而撰成的《天演论》。这种观点演变为僵硬地断言凡是新的必定胜过旧的）；第二，激进主义（这是指态度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喜爱暴力的倾向，它成了后来极左思潮的根源）；第三，功利主义（使学术失去其自身独立的目的，而作为为其自身以外目的服务的一种手段）；第四，意图伦理（即在认识上先确立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的立场，这就形成了在学术问题上往往不是实事求是地把考虑真理是非问题放在首位）。“五四”时代开始流行的这四种观念，在互相对立学派的人物身上，都可以或多或少地发现，而随着时间的进展，它们对于我国文化建设越来越带来了不良的影响。我们在回顾对二十世纪文化思潮发生巨大作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今天已经到了可以对它们作出清醒的再认识再估价的时候了。

一、“五四”是反传统的，但不是全盘反传统。“五四”时对庄子、墨子、韩非子以及小传统中的民间文学是肯定的。不过，第一，庄、墨、韩学说并不是传统中的主流，传统中占重要地位的儒家学说在“五四”时期是被激烈反对的。第二，“五四”对庄、墨、韩等的肯定，或是用来作为一种反儒的手段（如利用庄子反孔），或

是用来附会西方某种学说（如用韩非附会进化论与实验主义），还不能被视为是吸取传统资源以建设新的文化。第三，“五四”号召提倡平民文学，打倒贵族文学，固然使长期被湮埋的民间小说、山歌、民谣等得到重视，但同时将封建时期的士绅文化或精英文化一概目为必须打倒的贵族文化，却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一、“五四”时期在国学研究方面的两门显学是值得重视的。这就是晋鲁胜为之作注的《墨辩》，在亡佚千余年后，经清代毕沅重拾旧续，将其残编断简重新加以整理，到“五四”时则成为当时许多具有代表性人物所关注和研究的学问之一。另一种则是佛学唯识论和久被遗忘的《因明入正理论疏》，这门由印度输入的有关逻辑的理论也是当时为不少学者所关注的学问之一。可是这种热忱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无以为继了。倘得以深入下去，将会产生积极影响。当时在融化西学、开创风气方面做得较多的就是中国通史、哲学史、小说史等。

“五四”以来对于近代史的研究，偏重于改革思想的政治意义，而忽略了乾嘉时期以及乾嘉以后的学术发展，以至直到今天仍简单地称乾嘉学派只有考据训诂，而不知当时如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原善》、《绪言》，焦循的《论语通释》，程瑶田的《论学小记》等等，均具有重要的或一定的思想意义。对于乾嘉以后的学术发展与流变如陈兰甫、朱鼎甫诸人，强调义理，在兼融今古的立场上，重新肯定了宋明学术的价值，这些都是应当重视的。

附记：本文曾以《对“五四”的思考》为题收入拙著《清园论学集》。现加以修订与增补，交《辞海新知》发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Yu  
ZhongGuo

Xianzaimai

# “五四”与

# 中国现代化

· · · · · 张静如

把“五四”运动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联系起来，在前几年学术界就已经提出来了，也有些学者不以为然，总觉得谈中国社会现代化，只能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把“五四”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联系起来有点赶时髦之嫌。但我还是想谈谈我的看法，供研究者参考。

中国进入社会现代化过程，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虽然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可是直

到鸦片战争之前并未形成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必要条件。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中国社会也就被逼入了现代化的过程。然而，这种社会现代化是被动的、消极的，同时，受到多种力量的抵御和钳制，其中，既有不愿中国真正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外国势力，也有害怕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中国封建势力，还有本能拒绝社会现代化的因循守旧的小农

经济势力，故其发展是困难重重、极其缓慢，中国终究也摆脱不了贫困、落后、挨打、受辱的境地。在中国，要实现社会现代化，第一步就必须变被动为主动。也就是说，必须推翻阻碍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势力。鸦片战争后，为了挽救民族灭亡的命运，中国的先进分子和广大民众进行了多次的斗争。这些斗争，无论革命还是改良，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都是一种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的行为，都对这个过程作出了或大或小的贡献。如果以上分析是符合实际的，那么鸦片战争之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出现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无论起促进作用或起阻碍作用，都属于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都能够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自然联系起来，而“五四”运动正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

第一，在“五四”时期，从旧官僚到新军阀，从大学教授到小学生，从工农到商界、警察、狱卒、花界，从国内

人民到海外赤子，都以不同方式表达自己对国事的关心，都焕发出极大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虽然在“五四”运动中不少人对美国政府仍抱有幻想，但随后不久，先进分子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就达到新的质的飞跃，表现出爱国主义精神的升华。这种爱国主义具有极大的凝聚力，始终激励着后人为民族解放和富强而奋斗，也始终是中华民族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精神支柱。

第二，自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旨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建立资本主义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局表明，要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完全不可能的。“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从此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作为中介，“五四”运动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桥梁，使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没有中断或停滞，在总结旧的革命的教训的基础上找到了新的前进方向，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现又有了新的希望。

第三，“五四”时期找到了指导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理论武器。现代化事业必须有现代化理论作指导。辛亥革命的失败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坚定了中国先进分子弃旧寻新的意识。“五四”运动后，人们的思想得到极大的解放，热衷于从国外引进各种学说，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途径和方法。这些学说，概括起来，不外两大思潮，即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由于已看到了民主主义的缺陷，一些先进分子试图赋予民主主义新的内容，即把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但当时，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学说五花八门，除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外，还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一开始，人们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还处于学习、研究、比较、选择的阶段，相当多的人被空想性的、以和平改造为特色的学说所吸引，而对以阶级斗争为社会改造手段的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包括李大钊也觉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有缺

陷，主张用互助精神补其不足，于是“五四”运动后兴起工读互助活动。这些缺乏现实基础的空想试验都失败了，于是，一部分先进分子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种选择不是轻率的，而是经过多种比较、鉴别之后得出的结论。毛泽东在1921年元旦的新民学会年会上说得十分中肯：“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性质为多。”这个结论，反映了当时的客观事实。这种选择的结局表明，“五四”时期的的部分先进分子没有走错路。

第四，现代化事业必须有现代化政党来领导。“五四”时期为领导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各方面的准备。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机会使新兴的无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得到锻炼，并显示自己的力量，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广泛传播，也就没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就没有共产主义小组的出现。没有“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

建立就要推迟，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也必定要推迟。

第五，“五四”时期倡导的现代化意识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现开辟了广阔前景。有了现代意识，才能导引出现代化思想，也才能在实践上做出符合社会现代化要求的贡献。“五四”运动乃至整个“五四”时期在实践上体现出的具

有开放性、进取性、创造性特点的现代意识，广泛地影响了先进分子及广大民众，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现奠定了广泛的群众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五四”的精神也始终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去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现开辟道路。

(本文原系王章维著《“五四”与21世纪中国》序言，略作了删节。张静如，北京师范大学法律与政治研究所教授)

## 第四节

在“五四”初期，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在较弱程度上）反对日本在华的侵略立场，及同中国旧传统的斗争热情是自然的和完全可以理解的。造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决定性兴起的转折点是在“五四事件”后的一个阶段才出现的。在这个阶段也出现了西方人对运动所持的态度问题。一方面，一些曾在中国生活过的优秀的西方知识分子如杜威、罗素和芮恩施等，对这个现代化运动表示支持，认为这个运动如果彻底贯彻的话将会导致一个独立强大的中国。另一方面，大多数西方在华的经济利益代表则坚持那些维护他们特权的政策。他们支持那些能够保证他们在获取利润方面享有最大特权的中国腐朽的统治势力，而不管这些势力是怎样违背大多数中国人民利益的，也不管他们的行为是多么反自由、反民主的。（当西方最后作出维护这些利益的政策时，中国青年极感失望。这时传来苏维埃俄国决定放弃在华一切租界的消息，在当时的形势下人们对此感觉特别深刻，这当然促使运动的进步分子和左翼分子以及民族主义者重新确定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方向。把这些事件放在一起来看，对于任何企图理解中国人后来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态度似乎是十分重要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后来转为保守或消极，成了无足轻重的政治砝码。

—引自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

CongLiShi  
BenShen  
ShuoMing

LiShi

# 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

“五四”：

····· 朱维铮

“五四”时期的思潮，史学界以往一般分作三种：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民主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其实，那个时代的思潮十分复杂。例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功利主义，以及不同色彩的无政府主义，在当时对青年的影响，都大于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同样，以往说及“五四”运动是由谁领导的，一般地说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联合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主要指毛泽东、李大钊，再加一个瞿秋白。这个说法早就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再有，“五四”事件是怎么起来的，起来以后又是怎么样转向的？现在的说法也很笼统，“五四”开始时是一场学生运动，“六三”以后就变成一个由民族资本家、工人、手工业者等参加的爱国运动，这也受到质疑。“五四”事件本身是学生上街，但开始

时不仅仅是学生运动，其实它是得到一批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大学教授支持的。

“五四”思潮并不是一个单线的东西，也并不是可以简单地切成两片或三块。至于思潮本身所浮现出的各种各样的主义，在我看来，在当时的理解都与原型不一致。那些从欧美或者从日本移植过来

对“五四”运动本身研究得比较详尽的有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资料性的书籍也很多，我也编过，如80年代初被列为高校文科参考教材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一卷，便专门选录“五四”的材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丁守和主编的《五四运动时期期刊介绍》，介绍的很多刊物已经成为稀有文物，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思潮的多种侧面。（作者注）

的西方的思想、学说或方法，到了中国就变了位、变了形。比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其实旨在“修正马氏的唯物论”，以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偏颇，忽视了“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而单纯强调物质的变更，“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可见，当时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就“主义”来说，不合马克思的原型。

又比如，胡适讲的实用主义，也并不真正是美国杜威哲学的原型，其中掺杂了他早就从严复译著中拿来的赫胥黎的不可知论，因而他的“实验主义”，其实是二者的糅合。这是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所坦承的。然而胡适的理论以后在中国又再度变型，被化约为一句话，所谓“有用就是真理”。这在逻辑上必然导出一个问题：既然真理没有客观尺度，只是为了达到某种预设效应而采取的一种手段，那么对谁“有用”，便是判断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从“为什么人服务”的角度谈论实用主义，说是应该提倡“革命的实用主义”。但不知是否出于清除胡适思想影响的考虑，这句话在“毛选”中

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出现，可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蔽。（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